

緬甸中立外交的歷程及趨向

羅石圃

標榜中立外交的緬甸，一直都是左右搖擺不定，雖經大幅度左轉，惟在共產集團兩大之間，無論事齊事楚，都會遭到某一方面的懲創；略事右轉，則又受到兩面夾攻，所以只好採取鎖國政策——儘量避免國際往來。不過近年來緬甸的外交似乎已在改絃易轍，由其外長與自由國家政要觥籌交錯，而無視於觸怒中共和蘇俄，即已看出其真正中立外交的跡象。至於今後的趨向如何？只須了解緬甸軍方已將北平及莫斯科伸入其內部的勢力予以制衡，便不難探索到此一問題的答案。

(一) 舉棋不定的外交立場

二次大戰後新興的緬甸聯邦，在外交政策上，是舉棋不定，難以捉摸。如一九四八年一月宣告獨立時，仰光政府即表明不與蘇俄建交，及不承認東歐附庸。惟言猶在耳，至同年六月，其首任國務總理宇汝，又突然宣佈以蘇俄憲法為藍本的「左翼團結綱領」十五條，開宗明義即標明：「緬甸對蘇俄及東歐各國，應如對英美等自由國家一樣，立即建立政治外交關係」。至翌年十二月十七日，緬甸更承認中共政權。這都顯示其外策已作一百八十度的左轉。

但在此同時，宇汝及其外長與三軍統帥接二連三地訪問英倫後，即表明外交政策將追隨英倫。接着宇汝所作的外交政策聲明稱：「緬甸將遵循中立外交路線」。至一九五二年二月，宇汝又在抗日紀念大會上，面對着包括蘇俄中共等各駐緬使節，痛訴緬共叛國罪行，聲明政府將傾全力剿共，並揭露緬共頭目德欽梭等曾參加北平的共產國際大會，其叛亂是爲了執行國外的命令並獲得國際支援；且指出緬甸對具有侵略野心的國家，將無法長久維持邦交，只有英美等自由國家，才是緬甸的真正朋友。此一期間，仰光除獲得倫敦促成的「大英國協」所給予的援款外，並與美國訂立經援協定，全力展開十大建設，配合剿共軍事標本兼施，而美援專家也紛紛到達緬甸^①，顯示仰光政府的全力剿共政策，除軍事而外，並接受美國的經技援助，從事標本兼治。

註① 「從匪緬關係看劉少奇訪緬」，本刊、第五卷、第九期、拙著。

更值得重視的，爲仰光於承認北平政權的同時，居然默許滇邊反共軍出入緬北，且經由景棟王趙宰龍與滇邊反共軍訂立君子協定——允許後者在緬境建立後方基地及採購糧秣，並與當地駐軍暗中友好往來。當時一般認爲仰光爲情勢所迫而不得不承認北平，但又唯恐引狼入室，只有暗中借助邊區反共軍，始可阻斷緬共叛軍取得中共支援的通道。然而在瞬息之間，緬甸竟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案，除誣控我政府侵緬而外，且指美、泰都對緬境外軍有所支援，終致「聯合國」組成「四國軍事混合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將外軍全部撤離緬甸，因而使得中共支援緬共叛亂通道上的障礙，從此掃除。此一期間，北平與仰光之間的冠蓋往來既非常熱絡，且又在撤軍後興起了反美狂瀾，仰光亦迅即片面宣佈停止接受美援，甚至勒令所有美援專家限期離境^②。

自一九五四年開始，緬甸外交已顯著左轉，惟在中共與蘇俄之間，則傾向前者。仰光雖明知緬共的叛亂，乃爲北平所輸出的戰爭，而傾向莫斯科的緬共，則堅持議會鬭爭，其組成的「左翼民族聯合陣線黨」，且被政府承認爲合法政黨，但反而遠莫斯科而不惜對北平馬首是瞻。一九五五年的「亞非會議」，宇汝和尼赫魯及蘇加諾都曾仰承周恩來的鼻息，成爲發起人，且將蘇俄摒於大門之外，即可表明緬甸不惜討好中共的立場^③。

(二) 宇汝在北平的錚言

誠然，當周恩來於一九五四年六月，於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歸途中經由新德里再轉仰光，一再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1)互相尊重領土主權；(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內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處。周在仰光除指出此乃指導中共與緬甸關係的準繩而外，並強調各國人民有選擇本國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權利；雙方更在聯合公報中表明「革命是不能輸出的」^④。在宇汝的心目中，當時蘇俄在「日內瓦會議」過程中曾一力促成越南結束戰爭，顯然是唯恐東南亞共黨遵循北平的武鬥路線而造成中共勢力的擴張，故不能不先將越共拉入克宮標榜的「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藉以作爲此一區域各國共黨的榜樣；以致中共亦只有放棄輸出戰爭才能籠絡鄰邦，以免驅使它們轉向蘇俄。中共的此一轉變，對面臨緬共各派叛亂四起的緬甸而言，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不過，滇緬邊區中國反共軍的撤離緬北，以及蘇俄的被排出於「亞非會議」之外，雖都由仰光秉承北平意旨，使出了渾身解數的力量，但所獲得的報酬，並未換得中共減低其輸出的「革命」與戰爭。這從宇汝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訪平時在中共「政協全

註② 仰光(自由日報)，一九五三、八、廿三，一版。

註③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第四卷、第六期、黎世芬著。

註④ 「匪緬關係的過去與未來」，本刊、第七卷、第三—四期、李柏泉著。

國委員會」所發表的演說中便可窺知。他首先指出：緬甸與中共的交往，蒙其利的，並不止於緬甸，如果雙方缺乏持久友誼的誠心，必使彼此都會遭到禍殃。然後他就周恩來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逐條地將中共對緬甸的所作所爲，給予毫不留情地批判抨擊。談到中共破壞「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一項時，他更指控道：「坦白地說，緬甸人非常憎惡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臣服緬甸。任何陰謀控制或征服我們的企圖，都會遭到我們的反抗」。

宇汝對中共半公開地支援緬共、及挑撥煽動緬北少數民族叛亂，以至表現「強權作風」，更加以反覆痛斥：「一個在本國得不到支持而又受權勢慾支配的人，他會不惜借外力來奪取政權，並不惜成爲外國走狗。因此，外國培植走狗和僕人，並且透過他們來對另一國家的內政進行干涉，是可能的。今天我們在世界上可以看到這種卑劣的做法很流行，緬甸人非常憎惡這種邪惡的手段」。最後他並藉二次大戰時日本的下場，警告北平，斷言中共如果企圖統治亞洲，則必然會「從亞洲人手裏遭到災難」⑤。

宇汝在北平的這一席講話，不僅表明了中共支援緬共奪權的地下活動，仰光已一本全知；且顯示仰光有意當衆揭穿底蘊，促使北平檢討悔改。否則仰光在外策上便必須改絃更張，縱使不能迅速轉向自由陣營，至少也應該趨向真正的中立——縮短與英美及蘇俄的距離，藉以制衡中共的勢力。然而在宇汝兩度執政的十餘年之中，始終都是對北平馬首是瞻。連反對宇汝與中共訂結「邊區軍民友好往還協定」的緬甸軍方，雖不惜以政變奪得政權，但在上臺後，仍然在外交上走着前政府的親北平舊路，直至一九六七年始被迫一度轉向。

(三) 中共對緬甸的釣餌

緬甸聯邦政府雖對外親共而靠攏北平，但並沒有因此影響其對內的剿共政策。不過在中國反共軍撤離後，不但由中共一手哺育而成的緬共羅相部隊，乃以雲南爲其大後方，而其他民族叛軍，也大多獲得了中共的裝備訓練補給，以致政府軍處處受到了牽掣，連點線的防務都難以維持⑥。所以當尼溫率陸軍主持「看管內閣」時，即不惜讓滇緬邊區的中國反共軍再度興起，而無視於觸怒北平。在內政方面，採取以政治解決民族叛亂的問題；俾使軍方得以傾全力於剿共。同時緬美關係已獲改善，雙方並進行以美援建築「仰瓦戰略公路」的商談。

此一期間的中共，其對外關係已陷入困境，尤其是印尼於一九六五年「九卅」流產政變後，取代蘇加諾執政的蘇哈托政府斷然宣佈與北平凍結外交，而另一與它聲氣相通的印度，又因邊界糾紛和它化玉帛爲干戈，以致北平無暇亦不敢對仰光的軍人過渡

註⑤ 北平〔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十、三。

註⑥ 〔紐約時報〕，一九六九、七、廿五、刊載記者寶丁仰光特稿。

政府橫加干涉，所以仰光得以接受華府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及三千七百萬美元的經援，並近於贈送的價格自美國輸入所急需的軍火，更派遣觀察員參加「東約組織」的軍事演習^⑦。由此種種跡象可以看出，緬軍當政在外交上急於轉向自由陣營。所以當一九六二年尼溫再率陸軍以政變推翻親北平的宇汝政權而再度執政後，一般多認定仰光必將採取右轉外交。

誰知尼溫正式當政後，仍舊是在外交上仰北平的鼻息，不僅使已經成立了工程處的美援「仰瓦戰略公路」計劃撤消，而且使蘇俄援助興建的結貓洞水壩，及波蘭援助建立的糖廠等計劃，亦胎死腹中。對於中共以無息貸款的三千萬英鎊所規定的諸般建設，則繼續施工；由大陸湧入的技術員工，則充斥於全緬各地。尤其在建築「滾弄大橋」及由車里經猛勇至景棟的公路的工程中，來自大陸的員工更遍佈緬北。雖然緬甸與中共共同出兵夾攻滇緬邊區反共軍，迫使被緬軍視為防共屏障的義軍再度撤退，是宇汝二度執政時期的情形，但追源溯本，乃係尼溫在過渡政府時代親赴北平簽定雙方「邊界協定」所造成，無怪他正式當權後，仍然解脫不了中共的套索^⑧。

(四) 尼溫何以踏入了北平的圈套

中共對緬甸的策略，在宇汝於一九五六年在北平痛詆其以大欺小並提出警告後，便已重加修改。揆其原因，是由於滇緬邊區反共軍再起後，在緬甸陸軍過渡政府的暗中協助下，其聲勢更趨浩大，已東起滇寮邊界，沿滇緬全線直伸入滇、康、緬、印交界地區。且其時適值中共與印度爆發邊境之戰，康巴族反共軍又在康藏興起，而滇邊各地更有抗暴武裝紛紛揭竿起義。一經內外結合，將使中共無法控制，所以唯有不惜割地喪權的籠絡緬甸。

一九六〇年一月廿日，正當蘇俄宣佈黑魯雪夫定於二月訪問仰光之前，中共即邀請尼溫訪問北平，雙方並於廿八日簽訂了兩項條約：(一)「雙方邊界問題協定」，規定以談判方式劃清國界以及劃界問題談判重點——亦即同年十月所簽訂的「邊界條約大綱」，(二)「友好互不侵犯條約」，規定雙方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實即束縛緬甸不得參加「東南亞公約」。至於當時尼溫何以明知他的看管內閣為日無多，竟然甘於違反軍方竭力扭轉左傾外交方向的初衷而親赴北平簽約？原因是緬甸自獨立以來，對劃清滇緬邊界始終是夢寐以求，何況北平對此已作了出乎緬方意外的讓步^⑨。

在此一邊界條約下，中共將五萬五千方公里的中緬未定界土地，全部劃歸緬甸，此外又出讓「爐坊銀礦」開採權，及將英緬

註⑦ 「共匪與緬甸之關係」，反國際姑息主義者研究報告第卅二號。

註⑧ 同註⑦。

註⑨ 仰光《自由日報》，一九六一、一、十五—十七。

時代向中國租借的「猛茄三角洲」土地正式割予緬甸。此一三角洲土地乃為北撣邦與克欽邦交通的樞紐，假如中共收同，則將使克欽邦孤懸邊境。且該邦原為中國屬地，一直是中緬未定界的邊陲，再加上克欽族人與雲南山頭人同文同種，一般都通曉華語華文，都以中國人自居，二次大戰末期，我遠征軍反攻緬甸之所以能够旗開得勝，一半得力於克欽人的箠食壺漿歡迎王師。無怪緬甸獨立後，一直要求北平劃定邊界以免赤浪由此而來。至中共自願以條約將此未定界全部讓予緬方，緬甸朝野自都極表歡迎，並甘願以驅除先前視為防阻中共入侵的邊區反共軍，作為報答。

繼後尼溫政府為了制止黨派復起，除在政變的當時，已將各政黨與民族領袖一律拘囚而外，並熱中於組成統一政黨而以軍方為核心，以便實行一黨專政。緬甸國父翁山 (Aung San) 所標榜的「土地國有，工商業一律收歸國營」的政策，從此亦付諸實施。所以當軍方將此統一政黨定名為「社會主義路線黨」後，首先熱烈響應的，便是緬共和平派的「左翼民線」要員。此固然是由於此一和平派的緬共，一向主張「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軍方倡導的實行社會主義的政黨，正符合他們的主張；其實蘇俄乃在幕後竭力促成，俾便經由這一派緬共促使尼溫政府遠北平而靠攏莫斯科。

(五) 蘇俄策動仰光反中共暴亂的來由

尼溫政府由於決定了組成「路線黨」而推行社會主義政策，便已限制了其外交方向無法脫離共產集團。惟加入該黨的緬共，既然是遵循克宮所標榜的「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的份子，又何以仰光在共產陣營兩大之間，並沒有轉向莫斯科而更加倒向北平？此中底蘊，後來由蘇俄駐緬外交官亞歷山大·卡斯納契夫於投奔自由後始予透露。據稱當時在北平當權的劉少奇，曾允許緬共和平派採取與緬甸軍方聯合的政策而不親俄，以致克宮一時不能經由他們而拉攏仰光。更重要的，為尼溫政府實行工商業國營，外商所經營的工商企業都變為烏有，便難免引起外國的干涉，而近在咫尺的中共，如果以維護在緬華僑權益為由而出兵保護，更將使仰光大禍臨頭，至北平表明無意干預緬甸將工商業收歸國營，且願意為仰光訓練接收及管理人員，這使尼溫政府更不能不對它感恩戴德^⑩。

緬甸軍政府的組織「路線黨」而實行一黨專政，乃為多目標的企圖，除保障軍人政權可以永久專政而外，且認為在工商業國營及土地全部收歸國有後，政府既然控制了全國的生產工具與物資，所有叛軍——包括武裝緬共及各民族叛軍，在野無所掠的情況下，便唯有棄械投誠。此即將中共的殘酷統治手段在緬甸翻版。因此，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即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呼籲地下武裝黨團派遣代表進行和平談判，並聲明保障代表的安全，縱使談判破裂，亦必讓他們安全返回基

註⑩ 「匪俄對緬甸之爭奪」，本刊、第八卷、第三期、拙著。

地——在回程之中，斷不予以追捕。

此一在仰光舉行的和談大會，不僅緬甸國內的共黨各派都派遣代表前來參加，連一直設在北平的「緬甸海外共產黨」，也由中共以專機將它的代表們直接送達仰光。無怪緬方相信中共所作的竭力促使緬共各派響應和談以達成團結的諾言，並非外交詞令，誰能料想到這些代表均受到中共駐緬使館的嚴密控制，並在談判破裂後，由政府保護他們安全地返回了緬共的叛亂基地——勃固腰馬山區；更從而組成了「北京派」，使緬共主席德欽丹吞（Thakin Than Tun）在他們的包圍下，一變而完全聽命於北平。繼後此派緬共更效法中共的「文革」，由「紅衛兵」以殘酷手段，將所有主張與仰光軍方聯合的高幹，凡未逃脫牢籠者，都予以斬盡殺絕；且將「紅衛兵」組織伸入了仰光。在此情況下，前此加入「路線黨」的緬共和平派由於逃出山區的緬共元老們紛紛來投而迅速壯大；而緬甸朝野又無不對北平的公然支援緬共叛亂擴大升高及「紅衛兵」在仰光的猖狂，感到忿恨難已，於是爆發了仰光羣衆反中共的暴亂^⑩。

（六）緬共親俄派抬頭的經緯

一九六七年六月，仰光突然興起了反中共的羣衆暴亂。在怒潮澎湃下，中共駐緬使館遭到了羣衆包圍，其援緬專家劉逸遇刺身亡，所有華人商店也受到了禍殃。「新華社」駐緬特派員于民生亦由緬政府下令驅逐出境。仰光對北平事後所作的抗議及提出的懲兇賠償等要求，既置之不理，且聽任反中共的羣衆風潮，由仰光蔓延到全緬各大城市。中共駐緬使領館的食物既已遭到封鎖，便不能不將人員撤回，遂造成了外交凍結。但在另一方面，緬北的烽烟從而擴大，這顯然是中共由雲南輸入的戰爭所使然^⑪。

一般多認爲仰光的反中共羣衆風潮，乃起於廣大緬人憎恨中共教唆尼溫政府實行的殘民政策，造成工商業者都掃地出門，一經聽到反中共的呼聲，遂不約而同地擁向中共駐緬使館。由於掌握羣運的緬共一向都是聽命於中共使館，可見此次暴亂並非經由他們策動而來。其實加入「路線黨」的緬共和平派，乃爲領導此次羣運的集團。此派既然奉行劉少奇的指示——採取和平聯合的路線而不親俄，但在劉某遭到「文革」派的清閭下臺後，他們便意識到已被北平視爲異端份子，正好策動羣衆反抗北平而倒向蘇俄。所以從此以後的一段期間，尼溫政府的對外關係乃由親中共而轉向於蘇俄，其對內政策，也是出動重兵追剿被「北京派」所控制的緬共白旗派武裝。

據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五日的紐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莫斯科早已派遣大批情報員抵達仰光、瓦城，調查當地叛亂部族

註⑩ 「緬甸反匪羣運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本刊、第六卷、第十一期、拙著。

註⑪ 「中南半島新戰場——緬甸」、《中央日報》、駐緬記者魯居士仰光航訊。

與白旗緬共的實力，以及能否聯合將尼溫政府推翻。該報並指出莫斯科認為緬共親俄派如果無法奪取政權，便寧可仍由尼溫主政，斷不能讓緬甸落入親中共的緬共手中。顯然在緬毛交惡後，仰光於抵禦中共進侵的同時，又須圍剿白旗緬共而急需軍援，但對蘇俄的軍援迄未接受；不過由「北京派」所控制的白旗緬共老巢終被緬軍收復，以及其主席德欽丹吞在流竄途中遭到保衛員暗殺身亡，都不能不歸功於蘇俄特工人員經由緬共親俄派的策反工作。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被白旗緬共盤踞了十八年的勃固山區總部，終於被政府軍掃穴犁庭，使主席德欽丹吞不得不率領殘部在山區流竄。在是年九月廿四日清晨，這位緬共巨頭竟於出發時被其隨身的保衛員冒詔以來福槍襲擊而亡。在此之前，緬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耶波登密及軍中政委哥拉蘇，都能從「北京派」嚴密防範的基地，先後逃離而抵達仰光；槍殺德欽丹吞的兇手亦得以逃至政府軍營地投誠。這都顯示出策反工作的週詳，也說明了蘇俄特工及其在緬伙伴對尼溫政府清除中共勢力的貢獻，無怪此一期間北平與仰光關係已惡化到了在緬北大動干戈^⑬。

(七) 誰使尼溫與中共重拾舊歡

跨入七〇年代，中共與緬甸關係即逐漸重拾舊歡，雙方於重新互派大使後，尼溫亦於七〇年八月受邀非官方訪問北平，且獲得周恩來陪同到廣州。原因是蘇俄已與印度締結了友好條約，「真理報」且稱此乃「亞安體系」奠基的第一塊磚。緬俄既已訂了「航空協定」，蘇俄主席勃哥尼又定於十月經印訪緬，加上緬甸的俄援與專家源源而來。而在此同時，北平所指的緬共叛亂，因「緬北自衛軍」的興起而到處都遭到敵人。這批以華人爲主的自衛軍，不但獲得了仰光的補給造成聲勢浩大，且其影響力已伸入了雲南，並有得到蘇俄協力的跡象，環顧此時的越寮共也都有親俄勢力崛起，北平雖已致力於拉攏華府結束越戰，但在美軍撤離後，倘讓蘇俄勢力由越寮經緬甸至印度建成封鎖的南面長城，則比美國先前的威脅尤有過之。

基於上述情勢，中共急於與緬甸重修舊好，並以排俄爲目標。其時尼溫亦感到克宮經由「路線黨」內的緬共對他所施的壓力，日益沉重，更不願讓其國土淪爲蘇俄與中共代理人戰爭的戰場，所以樂於接受周恩來的邀請訪平。尼溫回緬後，即在軍事會議席上扣留「緬北自衛軍」司令昆沙（張奇夫），雖換取到了中共將緬共叛軍撤入雲南，惟造成了昆沙所屬的部隊紛起叛亂。尤其在他們綁架兩名蘇俄專家並提出以釋放昆沙爲換俘條件後，仰光在蘇俄的壓力下，又不得不讓北平眼中釘的昆沙得到自由。不過此時印支三邦的局勢已日益緊張，中共與蘇俄爲了爭取此三邦的共黨已無暇他顧，都不敢驅迫仰光倒向對方，所以尼溫政府得以乘勢突破鎖國政策，而與自由國家交往及貿易求援。

註⑬【德欽丹吞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Thakin Than Tun)，白一鶴譯，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一九七五年緬甸重新接受美援，雙方簽訂「聯合肅毒協定」，由美國在兩年內供應緬甸直升機十八架，雖載明為專供偵察毒品走私之用，但基於中緬共的赤化乃以毒化為先鋒，故實際上聯合緝毒即為華府對仰光剿共的軍援。同時緬方派遣駕駛美援飛機與從事保養工作的人員，赴美受訓，並由國防部軍情局長翁哈泰 (Aung Htay) 上校及司法部調查局長蘇明德 (Soe Myint) 率領前往。美國肅毒官員亦獲准入駐緬甸，緬美關係已由此改善。此外緬甸又獲加入「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且都會分別獲得貸款，所以在經貿方面，近年來也由大量逆差變為順差¹⁴。

仰光在接受自由國家的經技援助，進行「綠色革命」促使稻米大量增產，造成輸出數量與年俱增的同時，又接受外援探測開採石油，及發展重工業和石油化工工程，其中以日本的援貸款最多¹⁵。尤其自印支變色後，中共與蘇俄的爭奪焦點已轉移到了印支，都不敢不對仰光示惠沽恩，遂造成了緬甸在外交上得以引入自由勢力以便對北平和莫斯科發生制衡作用。所以尼溫敢於將權位交由其副手山友接替，並將當年的政敵如宇汝等迎回仰光。

(八) 仰光制衡中共與蘇俄的關鍵

尼溫政府對共產集團兩大之間的制衡，其關鍵時刻乃在於一九七七年二月的「路線黨」代表大會，在此之前，被視為尼溫繼承人之一的國防部長兼三軍參謀總長丁伍 (Tin Oo) 將軍，因牽涉到一次軍人流產政變而免除了本兼各職，使以「路線黨」總書記兼任國務委員會秘書長的山友 (San Yu) 將軍，又得以再兼統三軍。丁伍在軍中的脫穎而出，乃由他熱中於實行社會主義。當時地位僅次於尼溫的安基 (Brigadier Aung Cyi) 將軍曾因反對此一政策而被迫出家。丁伍則親率大批軍官前赴北平，接受中共給予的接管工商企業訓練，其一心傾向北平，由此可見一般。在緬毛交惡時，丁伍雖曾一度轉向，但在中共與緬甸重拾舊歡後，他對北平亦已恢復了舊誼。至其突然遭到削職，而又使曾經訪問過蘇俄的山友，得以黨政軍一身兼，自然會觸怒北平。

這一期間，尼溫要求訪平既得不到邀請，欲借訪問北韓之名，準備經過北平以便向中共當權派傾吐苦衷，亦未獲北平同意。而華國鋒且公然接見緬共主席德欽巴登陳 (Thakin Ba Thein) 進行所謂「友好會談」，「新華社」更稱「完全充滿團結戰鬥友誼……」¹⁶。這些跡象顯然在表明退出雲南的緬共武裝，可能即將向緬北捲土重來。至緬方決定將於一九七七年二月提前召開執政黨大會，這才得到了中共人代會副委員長鄧穎超的訪緬。繼後大會舉行中委選舉，有包括國務總理及副總理的政要十六人落選

註¹⁴ 卡穆 (Henry Kama) 於一九七五、七、廿五日在「紐約時報」，及八、六日在香港英文「虎報」所發表之兩篇報導，與八、七日「紐約時報」未署名專欄。

註¹⁵ 「緬甸關閉自守政策會放寬嗎？」及緬甸「綠色革命」成績驕人」，分別刊載於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十、廿四、及十二、十九、十三版、十五版。

註¹⁶ 「緬甸政局與對外關係之觀測」，本刊、第十六卷、第九期、拙著。

，其政府的職位也立即被解除，而尼溫亦得以受邀訪問北平而受到了隆重禮遇。由此不難看出這批被尼溫解職的政要，都有親俄嫌疑，以致中共必須除去而後快，仰光軍方自然也爲此感到了蘇俄的沉重壓力而不安。

據一九八〇年七月廿日「紐約時報」稱：自一九七七年以來，緬甸對蘇俄及其盟邦的壓力深感不安，除嚴密監視其外交使節活動，及減少其經技援助項目外，並在「路線黨」作大清洗——把所有被懷疑有親俄意圖的政治局委員，都拉下馬來。這更可證實當年包括總理在內的十六名仰光政要由中委落選到退出政壇，都是由於傾向蘇俄而觸怒中共所使然，不過蘇俄在緬的勢力雖因仰光爲彌補親中共的丁伍被削職而受挫，但它在軍事上，則扶植了一支緬共叛軍，致使仰光與北平的關係出現陰霾。

當年中共爲阻止仰光倒向蘇俄而不得不將它所卵翼的緬共武裝全部撤入雲南時，有一股留在緬甸中部山區的白旗緬共叛軍殘餘，却爲北平和仰光所遺忘。這股緬共叛軍嗣由俄越的爭取與支援，在兩年前即已竄到了薩爾溫江東岸，盤踞於「金三角」邊緣，取得了湄公河東岸的駐寮越軍支援補給。中共力主仰光出兵進剿，蘇俄則建議經由談判而予以收編。所以在上年趙紫陽訪緬前，緬外長即匆匆訪越，乃爲促使河內約制這股緬共叛軍接受仰光的收編。此後談判雖告破裂，惟迄未興起叛亂烽烟，因中共在滇寮邊區駐有十個師的重兵，一旦這股親俄越的緬共異動，北平即可向寮北進軍，將使在寮北的兩三師越南駐軍難以招架，以致緬北近年來亦仍可苟安^{①7}。

(九) 結 論

緬甸自印支三邦變色後，即能引進自由國家勢力，使中共與蘇俄的勢力得以制衡，這都是得力於共產集團中的兩大爲了爭奪三邦的領導權，不能不對鄰近的緬甸示惠，以免它倒向對方。因此，仰光雖已斷然退出「不結盟集團」，且對「亞西安」的立場亦表示支持，惟始終不敢加入此一東南亞區域組織，今（一九八二）年六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亞西安」十五屆年會，連巴布亞、新畿內亞、汶萊等都派有觀察員與會，唯獨仰光並沒有代表列席。如果我們了解「東協」自越軍侵棉以來，即已採取聯中共以反擊越俄的外交作戰，便不難窺知仰光不敢參加此一區域組織，正是由於不敢觸怒越俄。

誠然，緬甸的外交，近年來確已趨向於真正的中立立場，但由於外交乃內政的延長，而蘇俄與中共在緬甸都各有其代理人，且已參加了一黨專政的「路線黨」，值此尼溫引退未久，繼承他執掌軍政重權的山友，能否長期在內外關係上制衡共產勢力，維持真正中立立場？誠可謂前途多艱。

註①7 「中共與緬甸關係的陰霾」，本刊，第廿卷、第十期、拙著。